

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

唐 亮(日本 早稻田大学)

I.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较八、九十年代更为迅猛的势头持续高速增长。近几年来,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归纳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并大加赞赏¹的论文著作在迅速增加,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与“中国模式赞赏论”相对立的是“中国模式否定论”。亲欧美的中国国内自由派以及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不但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治压制以及“低人权优势”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对中国模式妨碍欧美式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显得忧心重重²。除此之外,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以中国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且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为由,提出了“中国模式未完成论”的观点³。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之前,围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一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进行过为数众多整体却显得较为零散的研究,官方则从政治路线和基本政策的角度进行过总结。而“中国模式论”试图从更为宏观更加综合的视角,对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以及作为现代化工具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然而,现阶段有关中国模式的大讨论虽然为我们在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确实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课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本文把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目标,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作为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架构⁴。第 1 部分简要地分析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

¹ 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是“中国模式赞赏论”的代表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2010 年 5 月 27 日)。张维为《中国震撼》(世纪出版集团,2011 年)则是最新出版的“中国模式赞赏论”的代表作。

² 以下的著作和论文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批判和质疑。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1 月。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南方周末》2008 年年 2 月 21 日电子版)、〈有没有中国模式?〉(《经济观察报》2010 年 4 月 5 日)、〈左右之争与昂纳克寓言〉(《SOHO 小报》2010 年第 3 期)、〈从南非看中国〉。秋风〈农民工体制与中国模式的终结〉,《凤凰周刊》2010 年第 19 号。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见定〉,秦晓〈中国模式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财经网 2010 年 5 月 18 日。许纪霖〈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历史主义思潮之批判者〉,《开放时代》2010 年第 5 期。本站发布时间:2010-6-5 7:16:06。木暮正義《是北京共识?》「議論百出」<http://www.gfj.jp/> (2007 年 6 月 18 日)。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Penguin Press HC, 2009。

³ 2009 年 12 月 7 日的《学习时报》的〈慎提“中国模式”〉特集中,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4 人分别发表论文,强调并非中国模式而应该是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

⁴ 潘维将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分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4 个方面,而汪玉凯分成政治、经济、社会 3 个方面。本文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对作为价值的文化和社会管制放在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角度进行分析。汪玉凯

这三大模式的特征，为定位中国模式提供分析的基础。第 2 部分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模式定性为新权威主义模式，或称其为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中国版，围绕体制的特征和手段的有效性将其与新权威主义型的其他次级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第 3 部分则从发展论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模式的前景加以展望。

II. 比较分析的视角和 3 大现代化模式

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模式时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相互之间的讨论经常会因为缺乏共同的基础而无法深入⁵。从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有的学者所讨论的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北京共识。有的学者既关注经济发展也关注政治民主化。从现代化的手段来看，很多学者谈论的是较为具体的政治经济运作经验，在笔者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极为长期的过程。具体的政策和运作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很容易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很难将其范式化。

为了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拥有一种共同的基础，需要对什么是发展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作出明确的界定。所谓模式，是通过对构成特定现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提炼，为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某种范式。社会模式通常是由目标和手段这两部分组成的，而绩效则是评价各种社会模式有效性的基础。所谓现代化模式是由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作为手段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两者所组成的。现代化的目标可以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所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增长模式，而广义的现代化则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有民主化模式。

从作为手段的制度架构来分，现代化模式又可分为单一模式和复合模式两种。单一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侧重于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复合经济增长模式则不仅限于经济体制，同时也把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考察对象。单一的民主化模式侧重于考察政治体制和统治政策对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而复合的民主化模式则不仅考察统治模式和统治政策，同时也考察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等对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而广义的现代化因为涉及多个目标，只能是复合式的现代化模式。

换句话说，广义的现代化模式，其目标主要指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架构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如果把政治体制分成民主主义体制、权威主义体制和全能主义体制，把经济体制区分为资本主义、混合型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话，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可以有多种组合形式。第 2 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欧美模式、社会主

〈冷静看待中国模式〉《中国改革法》2010 年 1 月 12 日。

⁵ 秦宣在〈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 年 2 月 21 日）一文中，根据对中国模式的各种讨论，对中国模式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理。

义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等三大现代化模式。

在三大现代化模式中，欧美模式最为强势。欧美主要国家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基本理念，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和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在实现高度的经济发展，建设福利国家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国家现代化的理念、目标和发展可能性。长期以来，对于非欧美国家而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欧美化。现代化的欧美模式不断地为其他各国所模仿。进入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美国家不断凭借其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优势，宣扬欧美模式的普遍性，并采用多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和善治(Good Governance)。华盛顿共识和善治分别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欧美式民主政治为蓝本。在这里，我们不妨将“新自由主义经济·善治模式”称之为欧美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欧美模式推荐版。

“新自由主义经济·善治模式”在现代化水平相相对较高的国家表现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对于依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环境和条件不同于欧美国家，欧美模式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工具未必有效。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要发挥其正常机能，需要具备法治、社会自律、有效政府等诸多的条件，这些条件的形成和确立无疑需要较长的积累过程。不具备这些条件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善治模式”作为现代化手段和工具在贫困国家中很少取得成效的基本原因。从作为手段的有效性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善治模式”在贫困国家的实践并非像支持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属于理念手段一体型，而应该说是理念先导型的现代化模式。

社会主义模式以前苏联为原型，试图在理念和体制的有效性方面超越欧美模式。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强调废除私有制，在所有制方面比较彻底地采用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凯恩斯经济学说，利用财政、金融，劳动，社会保障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节，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等微观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仅以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直接负责宏观经济的运作，同时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社会主义更强调平等，实行按劳分配的政策。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通常采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行思想控制及社会管制，实质上与欧美式民主政治完全对立。在欧美模式中，民主政治以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前提，在权力机关运作中引入分衡制约机制，提倡地方自治，就其本质来说属于分权型的政治体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政权把决策权、人事权及思想管制作作为统一领导的工具，牢牢掌握对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以及军队的领导权，以此加强政治上的凝聚力和领导能力。此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通过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和对媒体的管制，对民众的自由权利加以限制。在自由权利这一点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欧美式政治体制是相对立的。

社会主义者不仅宣称社会主义在理念上超越资本主义其价值具有普世性，同时也宣称基

于这一理念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更为有效。就其主张而言，社会主义模式是理念手段一体型的现代化模式。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模式在确立政治凝聚力，社会秩序以及发展经济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有效性，但并不像期待或预想的那样来得成功。而且存在着在对自由和权利的限制和压制、缺乏经济竞争活力等方面的严重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模式也是理念主导型的。

新权威主义模式由混合经济体制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两部分组成。作为理念型分析概念的权威主义体制被解释为介于欧美民主政治体制和全能主义体制两个极端中间的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出现了有限的多元主义，自上而下的大众动员变得相当有限，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在精英中存在的只是某种心理特质，随着制度化的进展，最高领导人不再深不可测，其统治方式和政策具备了一定的可预测性⁶。权威主义政治体制可以分成“军事独裁型”、“个人独裁型”和“一党领导型”三种基本类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不同类型在政治制度、专制手法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以行政权为主导的权力高度集中、严密的社会管制、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以及对反对势力的政治压制等各方面却是共通的。

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中，国家通常采用混合型经济体制，并通过以下的手段主导经济发展⁷。首先，国家掌控以土地、金融为中心的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培育战略产业。在这一方面，国有企业、国策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国家通过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提供电力交通等良好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第三，国家对设立工会的自由、集体谈判、罢工等进行严格控制，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劳动政策。第四，国家对进入国内市场采取广泛的许可认证制度和高关税等手段保护民族产业。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权力集中使得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更为容易。

新权威主义模式把经济现代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然而在政治理念、价值方面，只存在在像林兹所说那样的心理特质或者说是面向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而已。权威主义体制通常回避理念价值的普遍性，更愿意强调传统文化、国情等特殊性和特殊性。例如，权威主义体制经常以传统文化为由强调本国版的民主政治，抵制来自欧美国家凭借硬实力和软实力推销欧美式民主化的巨大压力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说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是理念主导型，那么新权威主义模式则应该说是一种理念手段分离型，或者说是手段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

6 高桥进《国际政治史の理论（国际政治史的理论）》岩波书店，第5页。

⁷ 近几年，国内外的某些学者把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高度干预以及混合经济称之为北京共识。事实上，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推进“追赶式”的现代化过程中，而决非中国的特有。

⁸ 例如，中国提倡中国式民主主义；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前首相提倡重视协商的“马来西亚式民主主义”；印度尼西亚的建国五原则则提倡“指导下的民主主义”。

III. 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中国版本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引进了以前苏联为样本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严重挫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从 80 年代起事实上开始了从社会主义模式向新权威主义模式的转型。东亚的高速发展是促使现代化模式转变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新权威主义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政治领导人对新权威主义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属于新权威主义模式。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中国版。具体地说，推行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的所有制上从国有、集体所有过渡到目前的混合型经济，经济运作从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转变到在灵活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对经济活动实行国家高度干预。政治体制则完成了从全能主义向权威主义的转变。政府在保留一党专政、媒体管制以及社会统制的同时，政治运作告别了个人崇拜，教条式的社会主义不再是完全支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唯一的意识形态，法制建设得到加强。

不过，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因为社会主义遗产的巨大影响，与其他新权威主义型的次级模式相比具有一定的特色，有效性也有所不同。首先，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的特点与其转型的路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情况下，权威主义体制的形成只是某种新的政治契机，国民国家的建设、政治秩序的安定、政治权威的形成、政府机构的建设、行政官僚的培养、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等则需要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此外，有一些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存在了较长的时间，但因为政治凝聚力不足而依然无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⁹。

当共产党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从前苏联引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之后，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极为强势的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从社会主义模式向新权威主义模式转型时，中国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其结果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模式在政治凝聚力、强有力的领导能力、稳定的政治社会局势等方面，继承了诸多社会主义模式的遗产。换言之，大多数的国家是从弱势国家出发，引入权威主体体制，逐步确立强势的国家的，而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则是从强势国家出发，在保留政治凝聚力的同时，逐步导入分权机制的。

军事独裁型和个人独裁型的权威主义体制由于有受到较大的内外压力，通常会实行形式上的民主主义体制，包括允许在野党存在，定期进行总统和议会的选举。这些权威主义国家不仅对在野党日常的政治活动严加限制，并且通过限制候选人资格、媒体管制、恐吓、贿选及选票作弊等手段，或明或暗地干预选举过程，以赢得选举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其政治运作受程序和手续的限制，在野党或政治反对势力也确实存在一定的政治活动空间。特别是在国内外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大选往往会成为在野党集结反政府力量实现政治要求的机会。

⁹ 例如缅甸。

这时，权威主义政权很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在 1971 年韩国军事独裁时期，在野党出身的金大中竞选韩国总统，仅以 97 万票败给了朴正熙总统，从而成为韩国民主势力象征之一。

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属于一党领导型，政治社会的稳定性相对较高。首先，中国严格限制结社自由，实质上不允许在野党的存在，社会团体从登记审批到活动受政府严密管制。其次，中国政府实行媒体国有体制，对报道、言论实行彻底的管制。第三，直接选举限定在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官方用各种手段操控选举过程，反体制势力利用选举进行政治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上述各种限制，反对势力及社会不满群体失去了大范围内进行组织和动员的手段，相对于其他一些权威主义国家，抗议活动基本上只局限于社交圈、亲友圈和社区等小范围内，中国政府可以非常容易地对应这些事态。近几年，虽然网格、手机等在群体性事件中开始被用作动员的手段，但依然受到严格的控制。

在军事独裁型和个人独裁型权威主义体制下，执政党主要是作为选票机器存在的。政治运作的制度化程度也较低，往往严重依赖于最高领导人。因此，最高领导者的更换往往会导致政界重组、政治混乱。当朴正熙总统 1979 年被暗杀之后，韩国的政治局势一下子变得变幻莫测。全斗焕为控制局势，在军方内部肃清对手的同时，对金大中等在野党领导人实施逮捕，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戒严令。全斗焕的行动引发了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而后的武力镇压造成了数百人流血牺牲的光州事件。

中国的权威主义体制是以党中央为核心、具有较强的政治凝聚力和领导能力。首先，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不仅是中央对地方、共产党对国家、军队、社会团体拥有强有力的领导权，而且在中央领导集团内部，最高领导人拥有极高的权威和极大的权力。第二，各级党委决策权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还能对具体的行政经济社会活动实施干预。第三，人事权、思想管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及与此相关的政策解释权、信息管制及舆论的主导权）都属于保障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以及维护严格的指挥命令系统的工具。第四，虽然最高领导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权威，但这是建立在以党的领导机构为核心的权力组织，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思想控制的基础上，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高。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经济现代化是由民间主导完成的。相比之下，采用新权威主义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资的管制与引进、产业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资金分配、国有企业及国策公司的设立等一系列方法，不仅从宏观层面还经常从微观层面对经济活动加以干预，主导经济现代化进程。不过，即便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各国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及干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许多国家在权威主义体制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获取并进而逐步提高干预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不过，即使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原先实行社会主义的权威主义国家干预经济配置资源的能力高于其他国家。

前面谈到，中国以前苏联为样本确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中央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劳动积极性不强缺乏竞争机制导致中国经济活力不足，同时也因为领导人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发生过大跃进运动那样的经济政策严重失误。然而，经过 20 多年的摸索以及人材和知识的积累，中国政府在政策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及行政能力都有所提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这些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具体地说，中国政府在保留经济计划能力和配置资源能力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引进竞争机制以推进经济现代化。换言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遗产使得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比其他国家更为容易。

政府能否在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压力面前保持决策的自律性十分重要。发展中国家不仅外交容易受大国意志的影响，而且由于人材、资金、技术、市场、经验不足等诸多原因，在经济发展上也容易对外国政府和跨国企业产生依赖。因此，其经济政策很有可能会被外国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利害关系所扭曲。在国内，权威主义政权往往与大地主、财阀、地方势力、工会等巨大利益集团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作为对支持权威主义政权的回报，经济政策很容易因为照顾利益集团而有所扭曲。例如，蒋介石政权的土地改革未能在大陆进行，却在台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由于蒋介石政权撤退到台湾之后，从地主阶级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日本的财阀改革、农地改革也是借助了联合国司令部的强大权力才得以顺利实现。

姚洋把政府在决策时能否从特定集团或个人的利益的瓜葛中保持中立，是否更关心国家的整体利益而非局部利益，能否更关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治收益等三点作为主要标准，把政策自主性强，重视长期利益、全局利益的政府称为“中性政府”¹⁰。在笔者看来，中性政府及政策的自律性的确是能够解释说明中国发展成效的有效概念，但是，这并不是中国模式的组成要素，而是中国模式的结果。具体地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政府彻底地清除了除官方团体以外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至今仍对非官方团体保持着严格的管制。其结果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和推进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能够从内外束缚中解放出来，保持高度的决策自律性。不过，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随着工业化、利益多元化的进展，以国有垄断企业、行业团体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已经开始通过政府关系网、专家、媒体等途径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

政策再好，如果缺乏政策执行能力，也无法获得有效的成果。中国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极为高效。土地征用、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革、加入 WTO 都是关系到千百万甚至数亿人切身

¹⁰ 姚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之一～之四，结束编）《南方周末》2008 年 9 月 11 日、17 日、10 月 2 日、10 月 9 日、10 月 22 日。此外，姚洋在〈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绿叶》2008 年第 6 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chinaelections.org/>。2010 年 2 月 5 日访问）一文中，把中性政府、财政分权、民主化探索、实用主义指导作为中国模式的特征加以提出。而从笔者的定义来看，第 2 点是政策，第 3 点和第 4 点是方法。

利益的政策问题。GDP 优先的发展路线，强行的手法经常引起工人，农民的反抗，但中国政府通过软硬兼施排除了各种抵抗。这里，道德评价另当别论，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改革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IV. 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评价及其前景

80 年代以来，中国以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也得到了逐步的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城乡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依然严峻，政治自由和权利依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样奇迹般的发展成果和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并存、前途并非十分明了的现实面前，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着眼于现实的某个侧面，对中国模式的有效性问题的提出了赞赏论、否定论、未完成论等 3 种观点。这里，笔者试图从理念的普遍性、手段的有效性这两个角度分析和评价中国模式，再从发展论的视角展望中国模式的前景。

如前所述，与其他 2 大现代化模式相比，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主要价值与其说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念，还不如说体现在其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手段的有效性上。二战以后，韩国、台湾及东南亚各国均采用了新权威主义模式，以巨大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有效性。中国从社会主义模式向新权威主义模式的转型以来，在 30 年间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有了逐步的改善。越南在 80 年代后期参照中国模式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成果。从反复被证明的绩效来看，新权威主义模式或者说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作为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有效性进行分析时，比较的对象不应该是起步早现代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而应该是那些以现代化为国家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起点相同，但采用了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秦晖的“低人权优势论”把握住了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提高对外竞争力这一事实。然而，以低工资、低福利为由否定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资金不足、技术和管理严重落后。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利用廉价劳动力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日本、韩国等在完成现代化之前，收入、福利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此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所采用的现代化模式并不适合国情，连利用低成本的优势都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未能提出普遍性价值的理念，而且现实社会不仅与理想社会还相距甚远，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公共服务的水准、社会秩序的安定性、自由和权利的保障等方面落后于许多国家，特别是远远落后于发达的民主主义国

家。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模式是难以成为样本的。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欧美模式在理念、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现代化进程等方面提供了样本、坐标轴，而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在“追赶式”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工具时才体现出一定的有效性。

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其理念与政治经济体制和欧美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也没有必要把两种模式看成是完全对立的。具体来讲，新权威主义模式在实现了良性发展的条件下，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外环境将逐步发生变化，并由此引发有关制度改革、政策转变的政治要求。而台湾、韩国的经验则表明了，新权威主义模式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其理念及制度架构朝着欧美模式靠近的可能性。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第 2 个阶段，最终是否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至少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间，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已经通过制度改革，从欧美模式中逐步吸取了一部分理念，机制和手法。

一部分的研究者将北京共识视为与倡导自由主义经济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物，并把中国经济发展认定为北京共识的成果。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并非事实的全部。正如姚洋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¹¹ 今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不断扩充市场机制、在投资贸易领域进一步推进自由化的可能性很大。在此，特别想强调的是：虽然北京共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同时欧美各国在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国情的情况下强行推行华盛顿共识又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然而，这些都不能说明北京共识最终能够取代华盛顿共识。

政治方面，在权威主义体制下，政治自由和权利依然受到各种限制，政治压制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中国政府努力推进法制建设、行政改革、信息公开，扩大政治参与，自由和权利也逐渐得到扩大。其结果是一党专政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政治结构政治运作慢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发生着变化。在毛泽东时代，统治很大程度上依靠专制的暴力。但在今天，虽然专制的暴力不时地发生，然而，在形成共识获取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统治已经成为历史的趋势。政府虽然强调不会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在政治运作中还是不断地尝试着引进民主政治的机制和手法。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人们也决没有满足于政治改革的现状。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及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意识趋向多元化，社会的自律性提高，对国家提出利益诉求、表示不同意见的情况正在增多。现阶段，虽说在国家和社会的

¹¹ Yang Yao, The End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 --Can China's Model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Survive? (Journal of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2, 2010)。就从姚洋一直积极强调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这一点而言，这样的点评就更是意味深长了。

关系上，政府仍牢牢控制着主导权，但力量的均衡正在逐渐向社会自律的方向发展。中产阶级的兴起，政治自由的空间不断扩大，草根 NGO 等民间组织也在艰难中逐步成长，民众的自发性政治参与不断扩大，政府不得不通过改革对社会的要求作出必要的回应。¹²

V. 结 语

广义的现代化模式，其目标主要指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架构主要是政治经济体制。第 2 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等三大现代化模式。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版，那么，从中国推行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起，就开始了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向新权威主义模式的转型。今天的中国模式从本质上属于新权威主义模式。或者从亚型模式的比较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其称之为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中国版。

自 80 年代向新权威主义模式转型以后，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性的高速增长，同时还在政治上逐步扩大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些巨大的成就足以证明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作为推进现代化工具或手段的有效性。即使与其他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次级模式相比，中国模式在政治凝聚力、维持社会稳定及资源调配能力方面也表现出较高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和其他的新权威主义模式一样，中国模式在理念的普遍性、对自由权利的制度性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只存在于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

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和欧美模式在现代化理念、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并没有必要把两者理解成完全对立的模式。与欧美模式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进化一样，在过去的 30 年里，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也在适应时代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引进欧美模式的理念，不断地作出改良制度的努力。今后，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是否会像东亚的一些国家那样出现解体，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中国能否在吸收消化欧美模式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明创造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模式，这些都将成为现代化比较研究中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课题。¹³

¹² 例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日本 NHK 采访时提到：“政治改革应集中力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首先是，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确保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以及监督权。第二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公平和社会正义。第四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 新华网，2010 年 6 月 2 日访问。

¹³ 赵穗生在把中国模式定位在过渡期的发展模式的基本上，认为在经济发展、法律改革、民主化和宪政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引进一系列的价值，而价值中立这一特征将逐渐消失。赵穗生《中国模式探索‘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chinaelections.org/>。2010 年 6 月 5 日。

(中文摘要)

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

唐 亮(日本 早稻田大学)

1980 年以后,中国以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也得到了逐步的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城乡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依然严峻,政治自由和权利依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在这样奇迹般的发展成果和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并存、前途并非十分明了的现实面前,学者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着眼于现实的某个侧面,对中国模式的有效性问题的赞赏论、否定论、未完成论等 3 种观点。

“中国模式赞赏论”着眼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较八、九十年代更为迅猛的势头持续高速增长。近几年来,把中国的发展经验归纳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并大加赞赏的论文著作在迅速增加,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讨论。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以及张维为《中国震撼》(世纪出版集团,2011 年)是“中国模式赞赏论”的代表作。

与“中国模式赞赏论”相对立的是“中国模式否定论”。亲欧美的中国国内自由派以及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不但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治压制以及“低人权优势”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对中国模式妨碍欧美式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显得忧心重重。主要代表作及论文有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南方周末》2008 年年 2 月 21 日电子版)、秋风<农民工体制与中国模式的终结>(《凤凰周刊》2010 年第 19 号),许纪霖<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历史主义思潮之批判者>(《开放时代》2010 年第 5 期)。

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以中国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且存在诸多严重问题为由,提出了“中国模式未完成论”的观点。例如,2009 年 12 月 7 日的《学习时报》登载了慎提“中国模式”>特集,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 4 人分别发表论文,强调并非中国模式而应该是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

在有关中国模式的大讨论之前,围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一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进行过为数众多整体却显得较为零散的研究,官方则从政治路线和基本政策的角度进行过总结。而“中国模式论”试图从更为宏观更加综合的视角,对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以及作为现代化工具的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然而,现阶段有关中国模式的大讨论虽然为我们在如何理解中国现代化问题上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诸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确实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课题需要做进一步的学术探讨。

首先,为了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拥有一种共同的基础,需要对什么是中国模式作更为明确的界定。所谓模式,是通过构成特定现象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提炼,为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提供某种范式。社会模式通常是由目标和手段这两部分组成的,而绩效则是

评价各种社会模式有效性的基础。所谓现代化模式是由现代化的目标以及作为手段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两者所组成的。现代化的目标也可以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指经济现代化，所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增长模式，而广义的现代化则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增长模式还有民主化模式。

从作为手段的制度架构来分，现代化模式又可分为单一模式和复合模式两种。单一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侧重于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复合经济增长模式则不仅限于经济体制，同时也把政治体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作为考察对象。单一的民主化模式侧重于考察政治体制和统治政策对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而复合的民主化模式则不仅考察统治模式和统治政策，同时也考察经济发展及社会结构等对政治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而广义的现代化因为涉及多个目标，只能是复合式的现代化模式。

迄今为止，许多学者在分析中国模式时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作明确的界定，相互之间的讨论经常会因为缺乏共同的基础而无法深入。从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有的学者所讨论的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如北京共识。有的学者既关注经济发展也关注政治民主化。从现代化的手段来看，很多学者谈论的是较为具体的政治经济运作经验，由于缺乏一定的抽象度，从而使得讨论的内容更接近于琐碎的政策论而非现代化模式论。在笔者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极为长期的过程，作为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该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具体的政策和运作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很容易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很难将其范式化。

其次，需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开阔学术视野。19 世纪以后，在欧美国家贸易政策特别是殖民地政策的冲击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然而所采用的现代化模式并不相同。迄今为止，主要存在着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新权威主义模式这三种现代化模式。三大模式还可以细分为众多的次级模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引进了以苏联为样本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过程中，中国又开始了向新权威主义模式的转型。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才具有更多的普遍性意义。无论是中国模式的定位还是认识理解中国模式的特点以及优劣之处，非常需要我们将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以及新权威主义模式下的次级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迄今为止，一部分学者对中印和中俄的发展特点进行了一定的比较，绝大多数的议论讨论仅仅是局限于中国的中国模式论。

第三，需要用发展论的视角去分析中国模式的前景。中国模式“赞赏论”着眼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否定论”着眼于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这两种主张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中国模式的某一侧面进行了解构，但却都没有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整体性评价。中国模式“未定论”着眼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发展论的观点指出了今后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却否认现阶段中国模式的存在。本文将在下面谈到，如果说欧美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是理念手段一体型或者说是理念先导型的话，新权威主义模式则是理念手段分离型或者说是手段主导型的现代化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价值，与其说是提供了一种普遍性理念和一套基于该理念的政治经济体制，倒不如说只是提供了一种有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

手段或者是工具。正如韩国、台湾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富有活力的发展进程中，理念、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构造很有可能发生一系列变化。

本文把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目标，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组合作为现代化模式的制度架构。在第 1 部分中，将围绕理念普遍性及工具有效性的问题，分析欧美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新权威主义模式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各自的优劣之处。在第 2 部分中，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出发将中国模式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版新权威主义模式，将其与新权威主义型的其他次级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进而从发展论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模式的前景加以展望。

